

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运行以及国家间的关系

费尔普斯教授在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学术演讲
(2007 年 9 月 10 日)

全球经济是由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 革命推动的。特别是由这些新技术所创造出的商业发展所推动。所以宽泛地说, 所有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近期的未来, 都是光明的。我等待了很长的时间, 才等到了美国经济的降温。导致这一降温开始的, 是住房建设活动的增长终于停止了, 并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商业投资也有所减弱。即使你不是个凯恩斯主义者, 不使用 IS-LM 曲线, 也能够知道, 各种投资活动是推动经济活动水平和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让我对此作一些解释。

当一国的企业家预计未来经济活动水平会更高时, 预计未来能从既定的经济资产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时, 他们马上就会希望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经济资源, 更多的雇员, 更多的顾客, 更多的商业场所空间, 更多的工厂, 等等。资产生产率的增长需要时间, 相应的, 家庭的金融财富的价值也需要时间才能增加, 就好像股票的价值在生产率提高之前, 不会立刻增长。因此, 家庭金融财富的增加和企业的商业存货的增加不会同步。结果, 应企业家对更多经济资产的需要, 对劳动力的需求首先增加, 但工资却不会马上提高, 工资的增加只有在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后才会发生。换句话说, 当人们充满对未来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时, 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 不会马上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而停下来。因为家庭不会因为未来可能的资产价值的提高, 而马上感觉到富裕。需求增加, 又没有抵消它的力量 (即工资的上涨), 就业率就会提高。于是高涨出现了。此后, 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如期实现, 家庭的财富增加了, 工资就会最终实现和生产率同等幅度的上涨。高涨时的就业率此后将会下降, 回复到正常状态。我认为这就是高涨的典型结构。

这种类型的高涨, 最容易出现在企业家精神旺盛、金融部门乐于向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但并不是只有这种有活力的经济体才能实现快速增长, 事实上, 快速增长不仅能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里产生, 还有可能出现在存在追赶机会的经济体中。因追赶而实现的增长, 和因制度和态度鼓励企业家精神而实现的增长, 两者存在很大差异。欧洲在 1955~1975 年间, 是迅速增长的典范。但这 100% 是一种追赶, 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欧洲企业家有了新思想, 也不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企业家。类似的,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也展现出了使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但我认为, 这主要是一种“追赶”型的增长, 因为无论是产品还是工艺, 都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将来不会拥有更多的活力, 一个包含制度变化的过程, 会赋予中国越来越多的活力。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 增长归增长, 但增长并不意味着有活力, 可能只是单纯的追赶。认为快速增长就有活力, 这是一种误解。

另一种对世界经济的误解, 是关于“火车头”的作用的。特别是常有人提到美国是整个

世界的火车头。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经历过一次高涨，但那次高涨却没有传递到欧洲。尽管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确有可能形成对其他国家出口产品需求的快速增加。快速增长国家实际汇率会升高，相应的低增长国家的实际汇率会降低，从而大幅度提升出口需求。因此不难理解，巴西的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速的放慢有紧密关系，随着巴西货币币值的相对升高，出口活动会减少。像巴西这样依赖出口的国家不理解的是，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间，还有其他的传导机制。美国经济的放缓，会降低利率，这会导致世界任何国家实际利率的降低，从而有助于增加巴西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投资。对于那些和美国之间没有多少出口联系的国家来说，美国经济的放缓是件好事，因为它从投资需求的增加中获得的好处更多。因此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美国经济放缓的效应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拉美和欧洲国家常有的误解，是认为市场系统通常是好的，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此决定繁荣与萧条的，始终是市场因素。但如果你在拉美和西欧呆了很长的时间，你很快就会认识到，许多国家的经济系统是不好的，它们对刚起步的企业家不友好，也不鼓励企业家们持有反对老企业的新思想，它们的金融体系具有封建性，它们的工会把劳动市场搞的就像中世纪一样，以便确保工作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完成，工会还主张工人要在战略决策中拥有同新投资的融资方同样大的发言权。在政府政策方面，银行和金融系统往往是政府的工具，它们给政治家的赞助人提供回报，为政治家的利益服务，但却不考虑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在西欧和拉美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态度方面，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在某些国家中，我们可以见到极其高的就业率。但这不是因为市场因素起了作用，而是经济系统瘫痪的结果。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是由内生的、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所驱动的，它们主要的动力，是本国和外国在产品和工艺上的商业和技术差距。如果这种差距，达到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产品差距的水平，这些国家中就会出现一波追赶。某些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说，20 世纪 70 年代的瑞典，失业率不超过 5%，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法国，失业率不到 1%。但法国现在的失业率是 8%，一年前则是 10%。这是因为，法国已经用尽了所有复制、模仿国外产品和工艺的机会，本国产品和工艺与国外最新产品和工艺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无法形成追赶态势时，制度和文化态度的真正面目就表现出来了。失业率于是上升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要想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在那里工作使人兴奋，人们渴望就业，失业率相应变得很低，投资需求旺盛，就必须有能使经济充满活力的制度和文化态度。因此，对经济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重新审视看待变化、责任感、承担风险、接受和发布命令的文化态度。

随着中国在追赶美国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中国将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活力，以便能继续这种高速的增长。就追赶美国而言，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会越来越少，就像要靠游泳来追上一条快船一样。这就需要创建更多的新制度，改善工人的态度，促使政府发展一种保护企业家及其新思想的机制。